

## “第二个结合”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基本条件、路径根基与践行原则\*

董志勇 沈博

**摘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金融界的重要任务，已不仅在于推进西方现代金融理论与中国本土金融实践的结合，还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货币金融思想，形塑着服务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历史文化根基，为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第二个结合”创造了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与中国传统金融思想在政治性和人民性立场上的高度契合性，则为“第二个结合”奠定路径根基，即紧抓本土金融故事灵韵，将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注入现代金融理论，实现本土传统货币金融智慧与现代金融理论的有机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立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六项基本原则。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金融强国

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是现代国家核心竞争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sup>①</sup>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均离不开金融系统对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强力支持。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在2024年1月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与可行路径。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事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加快形成，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不断加强，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逐渐下降。<sup>②</sup>然而，在加快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尤其在借鉴西方现代金融制度的过程中，影子银行、P2P等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让社会越发清晰地认识到，中西方金融实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纯粹借鉴西方的金融制度和思想理论，是无法充分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学习现有金融学理论讲述欧美故事的知识生成方式，通过认识和界定影响本土金融实践目标与行为的经

\*董志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现代化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邮箱：dzy@pku.edu.cn；沈博（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jjsshbenbo@cass.org.cn。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3CJL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青年项目（JJSQ-2023-09）。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当然文章自负。

①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08页。

②新华社：《推动金融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以来金融领域改革与发展综述》，2023年10月29日，[http://www.news.cn/2023-10/29/c\\_1129946920.htm](http://www.news.cn/2023-10/29/c_1129946920.htm)。

济环境,分析和确定中国现代金融的历史根基、关键动因和运行机制,加快发掘本土金融故事所蕴含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黄达,2018;张杰,2020;张晓晶、王庆,2023)。

有鉴于金融市场结构的不完全程度“被视为内生的”(艾伦、盖尔,2001)，“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之中”(戈兹曼,2016),讲述本土金融故事的素材,除本土金融实践外,还包括蕴含于金融实践中、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相适应的本土金融文化。早在20世纪前期,时人就意识到,中国有必要根据“中国金融的特性与需要”,构建“中国金融学的新体系”,而其中的工作就包括探讨“中国金融之历史的发展及其危机”(众北,1942)。后续一大批学者在梳理中国历史上的货币金融现象时,都或多或少注意到与之相应的政策实践与理论探索(彭信威,1958;萧清,1987;姚遂,1994;Glahn,1996;张家骧,2001;叶世昌等,2003;Zheng et al., 2013)。只不过由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仍处于引进和构建阶段,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和西方主流货币金融学在不同时期扮演着重要的指引角色,致使传统货币金融思想在现代金融学发展中失声。随着新时代开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前提下,唯有结合根植于本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金融文化氛围,良好的金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才能得以树立,各金融活动参与者方能真正受到德治与法治的双重约束,中国才能真正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中国金融学界的重要任务,已不仅在于推进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与本土金融实践的有机结合,还在于深入探索如何充分结合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金融思想智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渗入货币金融理论”(黄达,2018),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中做好传承与更新。

## 一、基本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金融思想智慧

尽管金融学在中国成为专门学科,是近百余年西学东渐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就不存在本土金融思想。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延续,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高低,还涉及风险应对能力的强弱(陈志武,2022)。而金融系统有助于将复杂且多样的社会关系范围和本质,在纵向上延展至时间领域,在横向上跨越空间距离,进而拓展不同个体的合作形式。一系列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表明,为了更好地跨期配置资源,提升应对生存风险的能力,先秦时期已出现一系列处理跨时空和风险问题的金融技术和活动。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征表明,那些有利于种族生存的文化遗产,一直在进行世代传承与更新,其中就包括那些协助跨时空配置资源和应对风险的金融思想智慧和技术工具。尽管囿于小农经济,传统社会的金融工具并未如现代金融这般多样复杂,主要集中于货币和信用领域,但其背后蕴含的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等金融思想智慧,却始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相一致。这些思想智慧塑造着服务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历史文化根基,为新时期“第二个结合”的充分践行创造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 (一)关于货币问题的思考与争论

货币是古代中国金融发展的脉络主线。至迟到商代,中国就初步形成了独立的货币系统。随着追求专制集权的统治者需要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内集聚资源,货币和市场得到进一步发展。货币由此嵌入传统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处理一系列与货币相关的现实问题时,“子母相权”“轻重”“虚实”等本土概念应运而生,成为传统社会讨论货币金融问题的专有范畴。

在商品流通和交换中,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有关货币流通及其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是早期货币思想关注的焦点。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理论”(萧清,1987),子母相权论涉及金属币材相同但轻重、大小不一的两种铸币(即“子母”)如何与价格适配的问题。《墨子》在明晰“轻重”对应货币购买力大小的基础上,指出货币购买力与商品价格反向变动的现象:“刀

轻则余不贵，刀重则余不易。”<sup>①</sup>《管子》对“轻重”一说作进一步说明：“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sup>②</sup>并在用“沟渎”形象阐释货币流通的基础上，提出类似于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sup>③</sup>

有鉴于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突出作用，人们通常将之与君主联系到一起。最典型的当属《管子》中的先王制币说。这一说法刻意模糊了货币出现与商业发展的历史关联，却也迎合时兴的“先王”理念。至于单旗“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sup>④</sup>的论断，虽说表达了货币本身具有价值的蕴意，但言语间仍暗含君主对货币发行的主导权。这一倾向在西汉中前期有关国家垄断铸币权的讨论中得到更极致地阐扬。贾谊提出“法钱”概念，主张依据法定的样式、成色与重量标准铸币，并在指责私铸之弊时，提出近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观点：“奸钱日繁，正钱日亡。”<sup>⑤</sup>贾山、晁错在将货币视为君主“操柄”时，认为货币价值由君权赋予，彻底滑向货币名目主义：“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sup>⑥</sup>桑弘羊进一步提出铸币“统一”主张：“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sup>⑦</sup>时人愈发强调国家垄断铸币权，关注依法合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以“轻重”御天下的思潮转向相呼应，迎合强化中央集权的潮流，更清晰地树立起“货币国定”的思想传统。

不过，当国家走向式微时，币值不稳定及相关社会问题，反而容易招致对金属货币和国家垄断铸币权等问题的疑议。在西汉后期的禹贡提出废钱用谷帛的主张后，东晋的桓玄、刘宋的周朗、南齐的沈约等人都曾在不同程度上重申废钱<sup>⑧</sup>用实物的主张。孔琳之等反对人士则认为，革除时弊的关键不在于废钱与否：“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sup>⑨</sup>鲁褒的《钱神论》虽在讥讽社会推崇金钱万能之风，但言语中也不乏对货币作用的肯定。面对货币贬值、私铸盛行等问题时，刘宋的沈演之、北魏的高谦之等货币名目论者力倡铸币贬损政策。但孔觊、沈庆之等人则不认同将货币视为“无用之器”，强调金属货币本身的实际价值，反对国家任意规定货币名义价值、发行不足值金属货币的做法。沈庆之甚至提出自由铸币的设想：“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准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sup>⑩</sup>后来，盛唐时期的张九龄也主张放开钱禁，以解决通货不足问题：“官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宜纵民铸。”<sup>⑪</sup>当然，这些主张终究为货币国定的声音所湮没：“自汉以来名臣高识者之笃论，皆以为禁铜造币，通开塞轻重之术。”<sup>⑫</sup>

随着商品经济走向繁荣，交子在北宋时期四川一带的出现，构成了古代中国对世界金融发展的新贡献。出于集权和应对财政问题的考量，纸币发行权很快被收拢到政府手中。面对“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sup>⑬</sup>的顾虑，人们意识到，纸币发行需要一定的准

①《墨子·经说下》。转引自吴毓江撰：《墨子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24页。

②《管子·山至数》。转引自黎翔凤撰：《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42页。

③《管子·揆度》。转引自黎翔凤撰：《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77页。

④《国语·周语下·景王二十一年》。转引自左丘明撰：《国语集解》，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6页。

⑤《新书·铸钱》。转引自贾谊撰：《新书校注》，闫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7页。

⑥《汉书·食货志上》。转引自班固著：《汉书》，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1页。

⑦《盐铁论·错币》。转引自桓宽撰集：《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7页。

⑧“废钱”并非要完全废止货币，而是限制乃至禁绝金属货币流通。

⑨《晋书·食货志》。转引自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6页。

⑩《宋书·颜竣传》。转引自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1页。

⑪《新唐书·食货四》。转引自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85页。

⑫张方平：《论钱禁铜法事奏》。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⑬苏轼：《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转引自苏轼撰、茅维编：《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4页。

准备金作为信用担保。“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sup>①</sup>的说法表明，时人已认识到货币发行无须遵行十足准备金制度。随着南宋全面推行纸币，讨论进一步集中于对通货膨胀的应对。“子母相权”“虚实”等概念，都在讨论中获得新发展。譬如，杨万里提出金属货币为“母”、会子为“子”的钱楮母子说，强调纸币与金属货币并行流通，能以一定比价互兑。杨冠卿化用“虚实”概念，指出楮币为“虚”、金属货币为“实”的对应关系，尝试解释人们贵重钱、轻纸币而导致钱荒的缘故：“楮虚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钱实也，藏之而无弊也。”<sup>②</sup>叶适还据此提出纸币驱逐钱币的观点：“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sup>③</sup>基于纸币可兑换的前提认知与币值稳定的目标取向，脱胎于平准思想和“少则重，多则轻”的货币数量论观念的“称提之术”，在南宋时期逐渐成型。其要点在于，分界发行纸币，通过金属货币或其他实物，定期赎回超过流通所需的纸币，使之与物价保持良好平衡，维持纸币的信誉和币值稳定。

尽管如此，由于缺乏对政府的有效约束，宋元数百年间还是不断出现纸币恶性通胀现象。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纸币持负面态度。一方面，他们多接受货币名目主义的货币国定论，认为“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sup>④</sup>另一方面，他们又带有货币金属主义的认知倾向，认为钞法的设立“须是以钱货为本”，特别是“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sup>⑤</sup>随着明初挽救宝钞的失败，国家强力推行的单一不兑换纸币制度，只能在洪武型经济体制的崩塌中没落。先期的禁钱行为与后续的私币滥铸之风，则击溃了铜钱的信用基础，最终使称量银成为民间市场的选择，加速了传统社会向“白银时代”的转向（邱永志，2018）。无论是丘濬提出的“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行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sup>⑥</sup>的银铜复本位主张，还是谭纶、靳学颜等人有关重钱而轻银、反对用银而废钱的主张，抑或是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反对赋税征银，甚至走向“非废金银不可”<sup>⑦</sup>的极端，都与当时货币体制转型相呼应，彰显着当时国家垄断铸币权与民间称量银自下而上瓦解君主利权的激烈角力。

钱贱钱贵、私铸私销等经典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清代。相关言语亦多沿用“轻重”“虚实”“贵贱”“相权而行”等经典概念，并落脚于政府角色及其干预强度。直到鸦片战争前后，随着银贵钱贱现象加剧引致社会经济危机，强调“以实运虚”<sup>⑧</sup>或认为“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颠倒”<sup>⑨</sup>的货币金属论，与强调“行钞之利，取之天地者也，故利无穷而君操其权”、意欲“使国家尽有天下百姓之财”<sup>⑩</sup>的货币名目论，一直在有关废银、轻银重钱等主张，抑或是行钞、铸大钱等旧论中，就政府干预程度问题争执不休。<sup>⑪</sup>讨论中亦出现一些新声音。林则徐、魏源关于仿铸西洋银币的主张等，连同与世界经济高度联动的白银一道，昭示着近代“西学东渐”劲风即将袭入传统思想的古老堡垒。

## （二）关于金融信用议题的关注和探讨

货币流通不仅促进商品的跨时空交换，还通过日益丰富的信用工具和技术，实现财富的跨时空

<sup>①</sup>周行己：《上皇帝书（二）》。转引自周行己撰：《周行己集（外一种）》，陈小平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sup>②</sup>杨冠卿：《重楮币说》。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7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sup>③</sup>《叶适集·进卷·财计中》。转引自叶适著：《叶适集》，刘公纯等点校，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60页。

<sup>④</sup>《元史·马亨传》。转引自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28页。

<sup>⑤</sup>王禕：《泉货议》。转引自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5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

<sup>⑥</sup>《大学衍义补·铜楮之币（下）》。转引自丘濬：《大学衍义补》（上册），金良年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

<sup>⑦</sup>《明夷待访录·财计一》。转引自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李伟译注，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81页。

<sup>⑧</sup>《王侍郎奏议·论行大钱折》。转引自王茂荫撰：《王侍郎奏议》，张新旭等点校，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92页。

<sup>⑨</sup>《钞币论·造钞条论七，许榷按》，许楣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许氏古均阁刻本。

<sup>⑩</sup>《钱币刍言·钱钞议九》《钱币刍言·钱钞议八》。分别转引自王鏊著：《〈钱币刍言〉整理与研究》，马陵合校注，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0页。

<sup>⑪</sup>19世纪前期的货币问题讨论，是“中国最后一次只凭着传统思想去处理难以捉摸的货币问题”。参见林满红（2011）。

配置。在推动借贷、典当、汇兑等信用活动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社会逐渐积累起一系列有关金融信用活动的规律认知和实操经验,形塑着诚实守信、义利并重的金融文化精神。

按目前学界一般观点,借贷的出现是私有制兴起、商品交换与贫富分化等一系列历史过程的产物。<sup>①</sup>《周礼》在阐述早期中国的理想政治模式时,就提到泉府经营赊、贷业务的制度设计。其中,“赊”主要覆盖祭祀和丧事等不计息、非生产性赊销;“贷”则面向以行业应纳税率计息的生产性贷款。后来,借贷活动扩大到私人领域。战国时期的孟尝君从事放贷取息活动。其门客冯谖曾奉命前去薛地讨债,收贷时与“当偿者”合“券契”,“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sup>②</sup>由此可见,当时已出现“券契”之类的无抵押信用放贷凭证,彰显着诚实守信、义利并重的厚重底蕴。

无论是实物借贷还是货币借贷,都离不开利息的确定和计算。就计息借贷而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借贷利率存在显著差异。按郑玄对《周礼》的注解,泉府对农业生产者的放贷利率是5%。而按《管子·轻重丁》的说法,战国时期面向农民、渔户、猎户的借贷利率是20%~100%。在汉代,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民间借贷需求更甚,以致高利贷频现。这时期的史书常有王侯贵族因“取息过律”获罪的记载。晁错等人也在控诉由“倍称之息”的高利贷引致的商人兼并农人问题:“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sup>③</sup>《算数书》《九章算术》等数学著作,亦收录了短期小额借贷利息的计算问题。这一方面佐证了高利贷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明,时人已具有描述货币时间价值的基本意识与技术。不过,文献似乎很少言明时人对利息实质的理解。而王莽改制时对借贷利息率的规定,多少暗含着利息源自纯利润的认知:“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本,计所得受息。”<sup>④</sup>

早期的放贷活动,多在政府与私人或私人与私人间进行。随着佛教在中古社会的兴起,寺院开始利用宗教活动获得的财富,经营借贷业务(谢重光,1989)。相比于此前以自有资本为主、“重视人甚于重视物”(周建波等,2021)的借贷活动,寺院借贷凭借教义的诠释和信仰的纽带,一方面以财物布施与赎身赎罪相统一的观念聚拢社会资本,培育着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通过宗教信仰的软性约束和官府强权的硬性约束,保障资金贷出与回笼的安全性,由此形成举贷(无须以物抵押)、质举(需以他物抵押)等形式,催生了质库、柜坊等新的金融机构。救济贫民的旗号和宗教信仰的加持,让这些被诟病为剥削平民的放贷、典当等业务得以突破伦理观念的束缚,真正走向社会化。到唐代时,律例条文亦有涉及对于实物放贷、抵押放贷等活动的规定,并在认可信用放贷、抵押放贷收取利息的同时,有弹性地限制利率,严禁以复利计息:“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并法外生利。”<sup>⑤</sup>

至于存款活动,早期由于缺乏专门的金融机构,时人多以窖藏或寄存亲友处等方式处理闲置资金。至迟到唐代,柜坊和寄附铺等商业店铺开始经营财物的寄存业务。在此基础上,依据特定物件、书帖等类似于支票的信物,兑付指定金额给第三人的新业务开始出现。在当时跨区域贸易活跃的环境中,这一合券取钱的新业务衍生了类似于汇兑的“飞钱”或“便换”。<sup>⑥</sup>不过,时人对存款之于金融活动的价值认知尚有偏颇。官方虽意识到货币惟有流通才能实现价值:“泉货之法,义在流通。若钱有所壅,货当益贱”,<sup>⑦</sup>但尚未意识到存款对金融活动的重要性,反而推出禁贮钱令。尽管官方禁限民间飞钱,但面对飞钱所聚拢的巨额财富,王绍、卢坦等官员主张以官营便换收拢,并最终演化为服

①希克斯(1969)指出,任何时代的金融交易实属“贸易交易的自然延伸”,只不过在货币出现后,货币贷款展现出比实物委托更为便利的特性。

②《史记·孟尝君列传》。转引自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60页。

③晁错:《论贵粟疏》。转引自甘肃师范大学注释组:《晁错著作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25页。

④《汉书·食货志》。转引自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1页。

⑤《唐会要·杂录》。转引自王溥撰:《唐会要》,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18页。

⑥吕思勉(2016)将之视为“版克(Bank)之权舆”。

⑦《唐会要·泉货》。转引自王溥撰:《唐会要》,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29页。

务于国家财政收纳、政府允诺兑现的官营平价汇兑。后来,由于两宋货币流通呈现区域割据的局面,兑换业务出现新发展。尤其在官营专卖茶盐的背景下,茶引、盐引等各类钞引因其市场流通性和变现性较强,促成了信用票据的交易行情。沈括注意到盐钞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潜力,强调要通过限量发行、统一发钞、统一官价、定期回笼、保证售盐收入等方式来保证信誉,“使民不疑于钞,则钞可以为币,而钱不待益而自轻矣”。<sup>①</sup>南宋初期关于改关子为交子的争论,亦有“官不收引”引致信用票据贬值的说法。这些说法多少为当时纸币的发行和管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商品经济繁荣的环境中,功利主义思潮也在为金融活动挣脱义利之辨的束缚创造新的思想环境。王安石变法时,面对韩琦、欧阳修等人依据《周礼》中泉府收二分之息之说反对青苗法,王安石以“其来日之不可维继”的理由反驳,强调用利息抵补政府支出的必要性:“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通,鼠雀之耗,而必欲广之,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则无二分之息可乎”,<sup>②</sup>将青苗法的利息视同对官营借贷运行成本的补偿。南宋的袁采进一步阐扬“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sup>③</sup>的富民思想,从贫富相助的视角论述借贷的必要性,并以仁爱观念主张取而不为虐的“中制”计息标准。然而,他也主张钱谷不可多借,认为“凡无远识者之人,求目前宽余,而那[挪]积在后者,无不破家也”,<sup>④</sup>隐晦表达其对跨期配置财富的偏见。

虽然历代都会限制借贷利息率一本一息的上限,甚至禁止息上加息,但现实中的民间借贷却多依循“子母相侔”<sup>⑤</sup>原则,收倍称之息,甚至另写借据,以行复利之实,致使高利贷现象不断。与贫富相助的富民思想言论相对的,是吕坤、宋应星等士大夫对“不杀穷汉安能富”<sup>⑥</sup>的控诉。明代徽商经营的当铺,亦成为士人批判的重点。尽管批评声不绝,但在士商合流的大背景下,金融机构仍随着商业发展而走向繁荣。内嵌于民间借贷业务的“券”和“会”,用以支持与润滑业务活动(何平,2022),表明了民间信用关系和金融产品的发展。由兑换演化出放贷业务的钱庄,随白银盛行而兴起的银铺、银炉和银号,以及在鸦片战争前后由晋商经营的票号等新型金融机构纷纷出现,共同催生着明清货币商人的金融文化(孔祥毅,2009)。他们顺承宋代功利主义思想,沿袭传统商人对于智、勇、仁、强的素质要求,尤其是遵奉孔子的仁义礼智信理念与关帝信仰的忠义精神,致力于塑造“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sup>⑦</sup>的新义利观,使传统金融活动得以适应并利用道德伦理所施加的软性约束,一方面争取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降低活动的交易费用。在真正面临西方现代金融的冲击之前,他们已在风险控制、资金管理、经营策略、网络构建、业务创新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与传统信用理念、义利观念、人本价值相适配的模式。

## 二、路径根基: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与传统金融思想文化互融共通

近代以降,尽管传统货币制度和金融机构在现代金融业冲击下逐步走向瓦解,但扎根于本土金融实践的金融文化精神精粹,并未随之尘封于历史的角落。纵观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的发展,虽说这些纷杂言论并未形成系统的学理,且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既有对于金融现象的进步认知,也存在抑制

<sup>①</sup>《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 熙宁十年》。转引自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928页。

<sup>②</sup>《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答曾公立书》。转引自王永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6—1307页。

<sup>③</sup>司马光:《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sup>④</sup>《袁氏世范·治家》。转引自袁采撰:《袁氏世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页。

<sup>⑤</sup>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上》。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398页。

<sup>⑥</sup>《宗约歌·戒放债》。转引自吕坤撰:《吕坤全集》(下),王国轩、王秀梅整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68页。

<sup>⑦</sup>《泾皋藏稿》(卷17),《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转引自顾宪成撰:《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

金融发展的观念束缚,但内在的逻辑主线和价值取向却仍相当清晰。无论是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名目论的持续争论,还是传统义利观和功利主义思想对计息借贷的不同解读,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立场取向,从而呈现出有别于西方金融思想的认知。对金融活动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强调,恰恰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在道德理想和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践行“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根基,即紧抓本土金融故事灵韵,将优秀传统金融文化注入现代金融理论,实现本土传统货币金融智慧与现代金融理论的有机结合。

### (一) 强调金融活动的政治性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素有与文化一体、和伦理同构的鲜明特点。传统金融思想亦通常附属于宏大的政治话题,笼罩在传统道德伦理秩序之下。由于家国同构的社会特性,政治文化与家庭生计反而在特有的系统观念中相互依赖,而非古希腊将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相区分的情形(阿伦特,1958)。社会经济危机的出现或民众的流离失所,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现实对道德理想所对应的政治秩序的偏离,并归咎于“德治”和“仁治”的缺失(金观涛、刘青峰,2011)。因此,无论是对于金融现象的剖析,还是对于金融问题的解决,传统士大夫往往存在明显的政治性立场,体现着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未雨绸缪防控风险的思路。

对货币起源问题的一般认知,折射出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性立场倾向。《管子》有不少文字谈及货币起源,其中最典型的、常为后世所乐道的,就是先王制币说:“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糴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糴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糴卖子者。”<sup>①</sup>这一方面呼应了传统士大夫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也彰显君王对铸币权的主导。《周礼》在阐述“司市”的职能时,也提出了与先王制币故事相类似的主张,即将铸币视为政府救荒的一项工作要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sup>②</sup>其逻辑是:灾荒年景时,因农作物歉收,市场物价会抬升,但金、铜等却不受影响,故政府可通过大量投放铸币,改变货币与其他商品的轻重关系,纾解民困。即使《管子·国蓄》提及珠玉、黄金、刀币因外来且稀有而成为货币的说法,但其一大推手仍系于君主:“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sup>③</sup>于是,货币问题及与货币流通相关的金融信用活动,便与迎合传统道德理想的“王政”绑在一起,而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基于“臣制财利则主失德”<sup>④</sup>的观念,对传统货币金融问题的讨论,便容易与王权结合,形成强调国家干预的规范话语。

当然,除专制王权的意识形态话语外,强调国家干预的论断,尚存在抑制因金融活动自由无序竞争引致一系列不良后果的现实考虑。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其一大弊端在于币制混乱将增加国家的治理成本和市场的交易成本,“法钱不立,将使天下操权族,而吏急而一之乎,则吏烦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势不可施;纵而弗苛乎,则郡县异而肆不同,小大异同,钱文大乱。”<sup>⑤</sup>此外,私铸厚利将诱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流向采铜、冶铸等行业,“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sup>⑥</sup>撼动传统国家的经济根基。到了纸币时代,类似说法仍未休止:“一定〔錠〕工本,可以造钞数百定〔錠〕。获利如此,人安得不乐为之?虽赴蹈汤火,亦所不顾”,<sup>⑦</sup>如此将“非独起劫夺之端,而实致祸乱之渊丛也”。<sup>⑧</sup>在传统认知中,农业才是国家经济的根

①《管子·山权数》。转引自黎翔凤撰:《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00页。

②《周礼·地官》。转引自孙诒让著:《周礼正义》,汪少华整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88页。

③《管子·国蓄》。转引自黎翔凤撰:《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79页。

④《韩非子·主道》。转引自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页。

⑤《新书校注·铸钱》。转引自贾谊撰:《新书校注》,闫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7页。

⑥《旧唐书·食货志上》。转引自刘昫撰:《旧唐书》,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98页。

⑦郑介夫:《太平策》。转引自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9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⑧《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上)·铜楮之币(上)》。转引自丘濬撰:《大学衍义补》,金良年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页。

本。于是,对高利贷活动的批判,通常也由商人兼并农人的现实有感而发。一方面,高利贷的巨额利润诱使更多的富商大贾脱实向虚,投身高利贷,加剧土地兼并和资本集中,而非支持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高利贷盘剥加剧小农的生活生产困境,拉大贫富差距,威胁农业发展。这就引致部分人对货币金融活动的否定:“生养之道,先食后[货]”,<sup>①</sup>甚至是根据金玉珠宝不能充饥的认知,要求社会“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sup>②</sup>以致滑向将生产和流通相对立的偏颇观念。但无论如何,这些不良后果都意味着现实对“王政”理想的偏离,亟须君主以德治和仁治加以矫正,进而便推出铜禁、禁私铸、官营借贷等主张。

暂不论那些过时偏颇的观念,传统货币金融思想强调政治性立场的内在理路,倒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国家与金融的阶级性认识颇有可对话之处。不同于古典经济学从个人主义的视角剖析市场经济,马克思经由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事实,质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贫困化现象,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的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符合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进程,但却因种种“保护性的反向运动”而未能得到彻底贯彻,所以,“那些对竞争体系的干扰和对市场的干涉,才应该对我们的病情负责”(波兰尼,1944)。然而,马克思并不认同这一逻辑,而是将矛头指向市场机制本身,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效率的同时,质疑其不公正性,由此将平等置于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中的突出位置。这一点正与中国传统社会所追求的道德理想目标相契合。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人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并非“意识形态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sup>③</sup>因而总附着于具有共同利益的特定阶级。正因为个人被置于“物质的生活关系”<sup>④</sup>中,商品经济中的劳动呈现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性特征,由此引致出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对立统一的二重性特征。随着自由的、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在近代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走向商品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呈现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二重性特征,即“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sup>⑤</sup>就资本总公式G—W—G'而言,按说流通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不会出现从G到G'的价值增值。但若货币占有者雇佣那些创造价值的自由劳动能力或劳动力,就能实现这一结果。这一情形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到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和实际上的从属,即资本家作为管理者和指挥者进入劳动过程,并直接剥削他人劳动:“从工人身上吸取剩余劳动,从而在利润的形式上吸取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sup>⑥</sup>由是,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深层逻辑上蕴含的不平等性。

正是基于这一不平等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资本与劳动利益相一致、市场自由竞争必然会带来普遍和谐与普惠福利的说法并不成立。一方面,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sup>⑦</sup>由于社会分工从一开始就包含劳动工具和材料等劳动条件的分配,由此就暗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进而就包含着资本与劳动的分裂。劳动与生产条件所有权分离、破裂乃至对立的最极端形式,就是“资本的形式”<sup>⑧</sup>。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现代国家是与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相适应的,并经由国债等,“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所以,其实质就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sup>⑨</sup>自是无法从根本上调解劳动与资本的分裂矛盾。另一方面,与私有化劳动分工密切相关的,就是市场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恩格斯指出,市场竞争使得“一切自然的合

①《后汉书·刘陶传》。转引自范晔撰:《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45页。

②《后汉书·桓谭传》。转引自范晔撰:《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58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211—21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页。



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因为卷入竞争者不全力以赴的话，就会“经不住这种斗争”而落败。<sup>①</sup>这就让那些在逐利的独立生产者不得不以“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进而使市场不断重蹈商业危机，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加速强者的兼并与私人资本的集中，让“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sup>②</sup>最终走向社会革命。

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逻辑上推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即与资产阶级相对的无产者将通过革命“取得国家政权”，并首先选择“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在他们看来，当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时，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将被取缔，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替代。<sup>③</sup>随着货币统治及其所附属的贪婪、恐惧等动机的终结，社会将进入共产主义所指向的和谐“共同体”。进而，如同中国传统道德理想秩序要求政府实行仁政与德治，在从现实迈向政治理想的进程中，由无产阶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必然需致力于规制资本的无序逐利和竞争状态，合理调配社会生产力，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必要的物质经济基础。反观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更是需时刻甄别“资本至上”的潜在不良导向，加强金融监管与治理，引导形成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依法合规的金融文化氛围，确保金融业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国家战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 （二）强调金融活动的人民性

在对传统货币金融问题的探讨中，与强调政治性相伴而行的，还有对于人民性的强调。在家国同构的传统政治道德秩序中，“以民为本”理念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经世济民”一说，便传达了传统士大夫在社会秩序整合中解决百姓生计问题的目标追求。因此，“以民为本”的价值标尺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形成了以安邦定国为目标、以“民生”为核心、以富民和养民为基础的古代理本经济观（叶坦、王昉，2021）。其间的逻辑在于：由于传统经济活动多附着于国家的政治活动，对于社会稳定的首要追求就压倒了对经济高速增长的追求，而唯有让平民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于是，评判国家干预货币金融活动正当性的重要标准，就在于是否符合“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主张国家干预的轻重论，也不免要以“调通民利”的话语，强调官营借贷活动调解与控制民间财富的正当性，让广大百姓“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器械钟饷粮食毕取贍于君”，以使“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sup>④</sup>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变革派和反对派之间对于青苗钱的争论，亦在引经据典的基础上抢占“以民为本”的道德制高点。反对派认为，天地间的各类物质财富“不在民，则在官”，青苗钱收息无异于“设法夺民”，<sup>⑤</sup>实为“残民之术”<sup>⑥</sup>。王安石则用“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sup>⑦</sup>一说加以回驳，强调“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时得者，钱也。”<sup>⑧</sup>事实上，随着宋明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功利主义思潮的发展，关于民间放贷收息是否利民的争论，也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一方面，部分人坚持揭露富人通过高利贷盘剥穷困民众的现实，甚至强调高利贷盛行所隐含的社会危机：“厉词追索弥年后，生计萧条起绿林。”<sup>⑨</sup>另一方面，部分知识分子依托贫富相济、不与民争利等话语，强调借贷在经济活动中的必要性，认为“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尽管贫富群体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7页。

④《管子·国蓄》。转引自黎翔凤撰：《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69页。

⑤《宋史·司马光传》。转引自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764页。

⑥《宋史·范镇传》。转引自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788页。

⑦《宋史·食货志上四》。转引自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80页。

⑧王安石：《上运使孙司谏书》。转引自王永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7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4页。

⑨宋应星：《怜愚诗四十二首 其三十九》。转引自《明宋应星野议 论气 谈天 思怜四种著作》，明崇祯刻本，江西省蔚挺图书馆藏。

“苦乐不均”，但却“彼此相资，以保其生”。<sup>①</sup>当然，鼓吹民间放贷的一大现实因素，还包括通过加速货币流通解决钱荒问题的考虑。

此外，由于古代社会缺乏对国家权力的充分限制，国家在面临货币和财政危机时，通常存在肆意发行不足值货币、实行“财政性通货膨胀”（张嘉璈，2018）的强烈倾向：“时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设为罔利之计，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财而专其利于己。”在这一情形下，对人民性立场的强调，就成为古代中国约束政府过度干预和剥夺百姓资财的重要理由：“夫上天立君以为生民之主，盖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专天下之利也。”<sup>②</sup>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政策的重要理由，正是“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也就是说，在灾荒时铸钱济民，本符合传统政治道德要求，但铸大钱、废小钱将使民众手中的小钱丧失价值。这无异于“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sup>③</sup>南朝时期的刘尚之在反对“以一大钱当两”的政策主张时，同样提出顺应民情的原则：“凡创制改法，宜从民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sup>④</sup>迨至宋元纸币大行其道之时，许衡痛批“嘉定以一易二，是负民一半之货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负民四倍之货也”的现象，强调政府通过贬损楮币来攫取百姓财富的行径是“无义为甚”，主张“以实货收虚券”的政策，以期“救目前之过而无愧百姓”。<sup>⑤</sup>不少人基于“米乃民之命脉，而苦于直之涌；楮乃民之血脉，而苦于直之低”<sup>⑥</sup>的认知，主张政府应该积极采取稳健审慎的救楮政策，而非急功近利，“剜心肉以救眼创，拨根本以扶枝叶”。<sup>⑦</sup>面对反复的通膨给民众带来的苦痛，不少知识分子甚至倾向于支持钞币使民众贫困化的论断，呼吁政府避免“以利国为重，利民为轻，以至于误天下国家”<sup>⑧</sup>的短视之举，复行铜钱。

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蕴含的人民性取向，同样与马克思、恩格斯在思考和讨论近现代货币与资本问题时秉持的人本取向存在相通之处。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从抽象规定性视角看，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从现实存在方式看，人也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宋冬林、孙尚斌，2023）。鉴于此，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日趋形式化和工具主义的分析，马克思语境中的“货币”和“资本”，同样隐含着“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sup>⑨</sup>其中，作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sup>⑩</sup>货币在物质上与空间上创造交换价值真正一般性的同时，却也衍化为“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sup>⑪</sup>使得交换关系发展为外在于个体劳动者的异己权力，即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并非“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在交换中表现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sup>⑫</sup>随着商品形式日益普遍化，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成为商品，以致生产过程中的所有要素转化为“资本”。此时，人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sup>⑬</sup>衍化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基本经济职能的代表而产生相互关系，并在资

①司马光：《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②以上两语出自《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上）·铜楮之币》。转引自丘濬：《大学衍义补》，金良年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

③《国语·周语下》。转引自左丘明撰：《国语集解》，徐元浩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7页。

④《宋书·何尚之列传》。转引自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5页。

⑤许衡：《楮币札子》。转引自许衡撰：《许衡集》，许红霞点校，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89页。

⑥吴潜：《内引第三劄奏论尹京三事非其所能》。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⑦吴潜：《再论计亩纳钱》。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⑧郑介夫：《太平策》。转引自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9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74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6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本主义生产阶段呈现作为劳动条件占有者的资本家与作为劳动能力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一般异化具化为异化劳动，即雇佣劳动者被内在地异化于“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他人的劳动能力”“他人的劳动”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部要素。资本家因充当监督者和指挥者而获得“自己的绝对满足”，工人则沦为“牺牲品”：<sup>①</sup>劳动能力的占有者因生产消耗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却又总因“作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分离的单纯主体的劳动能力”而开始新的苦工。<sup>②</sup>透过揭示劳动及其实现条件相分离的不公平性，马克思深刻揭露了与个体劳动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sup>③</sup>相悖离的现实，强调个人自主性与平等性在资本主义中的实际缺失，进而批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在揭露现代资本逐利性和阶级性的同时，马克思还注意到，随着产业资本平均利润率的下降，通过竞争和信用两大杠杆集中的资本基于逐利的目标导向，将越发需要加剧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盘剥。过剩的资本甚至转向金融资本，推动经济金融化趋势，在去工业化压缩广大劳动者生存空间的同时，加剧社会贫富分化问题。

在马克思的历史视野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完整的人→人性异化→人性复归”的过程。所谓人性的复归，就是人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因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以求达成“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④</sup>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异化”在相当程度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经之点”。因为只有当生产力充分发展时，才能构筑“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sup>⑤</sup>这意味着，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其实“走的是同一条道路”。<sup>⑥</sup>于是，在人类社会朝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程中，无产阶级的重要任务就在于将自我从私有制的枷锁中解放，让私有的生产资料转变为“联合的工人的财产”，<sup>⑦</sup>让社会生产依循“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制定的共同计划进行”，<sup>⑧</sup>进而克服和化解异化问题。

如同中国传统道德理想秩序与民本观念的密切关联，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立场也是高度融合的。马克思主义评判现代社会组织原则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重要基点，就是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判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⑨</sup>马克思并未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所关切的是效率优先的经济伦理所引致的经济公平问题。在他看来，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唯有经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作，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然而，在不断对新产生的雇佣劳动进行剥削的生产关系中，资本沦为了资本家“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但在强调资本社会性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中，资本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sup>⑩</sup>鉴于此，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代中国，致力于促进资金融通的金融业，更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持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产品服务体系 and 金融监管体制，避免因私有资本无序扩张而出现的操纵市场、控制劳动、加剧贫困化等局面，引导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发挥“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机制”（胡家勇，2022），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实现，力求在公平正义、经济效率和人的解放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非陷入金融危机与社会冲突的“死胡同”。

### 三、践行原则：“六个坚持”原则推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将加快推进金融强国的建设目标。经过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从规范秩序、巩固体制、平衡关系、深化改革到纠偏正向的主题基调

<sup>①⑤</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73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sup>③</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sup>④⑥</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182页。

<sup>⑦</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sup>⑧⑨⑩</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422、415页。

转变,当前我国已将金融工作上升至国家整体战略选择的新高度,金融的创新发展成为了我国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2024年1月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强国”的目标内涵,除了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外,还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sup>①</sup>在新时期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两个结合”。尤其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我们有必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植本土金融实践的历史文化根基,更好夯实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当然,这既不意味着我们要闭门造车,进行本土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复古”,也不是要唯我独尊,盲目否定西方现代金融理论,更不是简单的中西体用之争。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第二个结合”,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坚持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坚持”原则。

一是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立场是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共同秉承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得以被中国人民接受并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伦理根基。尽管近现代中国在现代西方各种观念和制度的冲击下走向现代文明形态,但将社会生计和公正分配视为道德延伸的经世济民传统,始终仍在影响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观,积淀着中国经济实践的思维模式和伦理底色。不同于理性人假设前提下的个体通过市场竞争来协调个人利益冲突,共享孕育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合作的潜在可能(杨瑞龙,2023)。有鉴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诠释着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生成的正当性基础:“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sup>②</sup>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自不能脱离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合理性起点,引导各类传统金融和新型金融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二是坚持自信自立。尽管在现代金融学话语体系中,东方世界的金融思想长期处于失语或缺位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缺乏本土的金融文化。虽说古代中国并未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理论体系,但却也积淀着诸多具有创新价值和普世意义的洞见。关于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规律,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管理的思考,货币国家化和非国家化的争论,货币名目论与货币金属论的摇摆,货币金融自由放任政策与干预监管政策的争辩,义利观对金融文化的形塑等,都是深嵌于本土金融实践的思想智慧,蕴含着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等文化精神,甚至还能当代中国金融学跳脱政府和市场、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公平和效率、主体和客体、短期利益与长期效益等二元对立的经典困境,提供思想和方法论层面的启发。因此,应该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sup>③</sup>填补现代金融学话语体系的东方“空白”。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一直以来,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是社会发展面临的终极挑战。千百年前,中华儿女就已通过“均贫富”口号,表达对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憧憬。两百余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依据资本主义财富快速增长和贫富急剧分化的现实,揭露古典经济学在功利主义框架下所秉承的规则公平原则的缺陷,进而提出追求实现公平正义、经济效率和人的解放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已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但“资本深层结构和社会不平等的现实”(皮凯蒂,2014)尚未有本质性改变。尤其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对市场的控制、对人性自由发展的抑制、对实体经济的脱钩,正在因技术和数据的绚丽外衣而变得更为隐性。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要素,同样也存在逐利性、流动性和扩张性的一面(胡怀国,2022)。因此,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仍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引,结合中华民族一直

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月17日。

②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4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以来对货币金融问题所秉承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立场,推动优秀传统货币金融思想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文化精神层面引导当代中国金融不逾越底线、不唯利是图、不急功近利、不脱实向虚、不胡作非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两个结合”,并非在于构建与现代西方金融学相对峙的中国金融理论体系,而是要切实为构建适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金融体系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引。正如古代中国货币金融思想的核心内容始终围绕货币的发行、流通和管理展开,具有显著的问题导向和现实意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于货币、资本和金融信用机构的讨论,更是依托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与财富分配不公的贫困化问题而展开。当代中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尚面临着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质效相对有限、金融监管效能有待提高、金融腐败和金融犯罪现象仍不时出现等诸多突出问题,亟须在效率与公平、稳增长与防风险、开放与安全等问题上寻求突破口。这就更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指引,结合支撑本土金融运作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升中国特色金融理论对中国现实货币金融问题的描述、分析、解释与解决效力,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五是坚持系统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偏向于关注社会系统中“不同个体、要素、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董志勇、沈博,2023)。正是在家国同构中,传统对货币金融问题的讨论,被置于社会整合和理想道德秩序的框架中,进而显现出与“王政”理想相关联的政治性立场,以及与经世济民情怀相迎合的人民性立场。而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样将“人”“货币”“资本”等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揭示因社会分工而引致的异化,以及资本与劳动分裂的内在矛盾。凡此种启发我们,货币金融的运作深度内嵌于经济系统乃至社会系统中。在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时,绝不应只局限于对金融现象和问题本身的关注,应培养形成系统观念的宏阔视野,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的思想,在整个经济系统乃至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如此方能“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sup>①</sup>做好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规制资本的无序扩张,防范系统性风险,确保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保持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应有的批判性和实践性。

六是坚持胸怀天下。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中国特色”所在,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底色外,还包括优秀传统货币金融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代西方金融学的否定。毕竟,随着现代金融活动的发展创新,西方金融学的核心议题已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宏观层面的资金融通,延展到微观层面的收益与风险权衡问题。除货币理论、利息理论、银行理论、金融政策等经典议题外,西方金融学在资产定价、风险度量、公司金融等领域亦有深刻洞见。这对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培育而言,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应看到,依托本土金融实践、融通古今中外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的创新实践和监管治理,后发国家金融深化和开放路径,规制资本无序扩张,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统筹金融开放与安全等议题上,具备广阔的“用武之地”：“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sup>②</sup>

#### 参考文献：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sup>①</sup>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08页。

<sup>②</sup>《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 习近平,2021a:《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
- 习近平,2021b:《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 汉娜·阿伦特,1958:《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
- 富兰克林·艾伦 道格拉斯·盖尔,2001:《比较金融系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
- 卡尔·波兰尼,1944:《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中译本。
- 陈志武,2022:《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上),中信出版社。
- 董志勇 沈博,2023:《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必要性、可行路径与基本原则》,《教学与研究》第8期。
- 威廉·戈兹曼,2016:《千年金融史》,中信出版社2017年中译本。
- 何平,2022:《转型期明清中国货币的结构性使用方案及其局限》,《经济思想史学刊》第3期。
- 胡怀国,202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要素:特性、作用和行为规律》,《经济学动态》第9期。
- 胡家勇,2022:《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资本的作用》,《经济学动态》第10期。
- 黄达,2018:《金融学研究基础,必须强调再强调》,《国际金融研究》第2期。
- 金观涛 刘青峰,2011:《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法律出版社。
- 孔祥毅,2009:《“明清金融革命及其货币商人”之十一:明清货币商人的金融文化》,《金融博览》第12期。
- 林满红,2011:《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译本。
- 吕思勉,2016:《吕思勉全集8:隋唐五代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 彭信威,1958:《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托马斯·皮凯蒂,2014:《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中译本。
- 邱永志,2018:《元明变迁视角下明代货币白银化的体制促因》,《中国钱币》第1期。
- 宋冬林 孙尚斌,2023:《论人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经济学动态》第2期。
- 约翰·希克斯,1969:《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中译本。
- 萧清,1987:《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 谢重光,1989:《晋唐寺院商业和借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 杨瑞龙,2023:《中国微观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的构建》,《经济学动态》第4期。
- 姚遂,1994:《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 叶世昌等,2003:《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 叶坦 王昉,2021:《对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传承与超越》,《人民日报》11月29日。
- 张家骧,2001:《中国货币思想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 张嘉璈,2018:《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中信出版社2018年中译本。
- 张杰,2020:《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基于本土化批判吸收的西学东渐》,《经济研究》第11期。
- 张晓晶 王庆,2023:《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基于国家治理逻辑的金融大分流新假说》,《经济研究》第2期。
- 众北,1942:《中国金融学的新体系》,《大学月刊》第11期。
- 周建波等,2021:《中古时期寺院借贷的中国化问题》,《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
- Glahn, R. V. (1996),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heng, X.Y. et al.(2013),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from a Chine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 Economic Review*, 26: 89—104.

## To Cultivate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Second Combination”: Basic Conditions, Path Basis, and Principles of Practice

DONG Zhiyong<sup>a</sup> and SHEN Bo<sup>b</sup>

(a: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b: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Summa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key aspects such as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high-qualit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the strong support of high-quality modern financial services, the Central Financial Work Conference held in Beijing in October 2023 explicitly put forward the goal of building a financial powerhouse.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a seminar 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for key leading cadres at the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level held in January 2024,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urther proposed to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and actively cultivate a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rovides an important directional guidance for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as well as feasible working guidelines for taking the path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opic of cultivation of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ries to discuss the basic conditions, the root of the path,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racti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financial theory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thought, on the basis of the CPC’s initia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especially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pecifically, based on interpre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lassical Marxist theoretic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main point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thought and the Marxist financial theory, and searche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basis for the dialogue of the two, so as to promote the better combination of local traditional financial wisdom and modern financial theory, and deepe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oots of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be summarized in two aspects. Firstly,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money and finance provid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modern financial syst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serves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creates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second combination”. Secondly, the high compatibility between Marxist financial theor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financial thought in terms of political and people-centered standpoints has laid a key path foundation for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political standpoint emphas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pheres, while the people-centered standpoint regards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s an essential value judgement standard for analyzing, solving and evaluating different kinds of financial problems.

This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fostering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adhering to the following six principles: (1)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2) maintaining self-confidence and standing on our own feet; (3) innovating on the basis of what had worked in the past; (4) taking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5) applying systems thinking; (6)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in three ways. Firstly, it attempts to provide traditional Chinese wisdom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odern financial theory, and enrich the discussion on the topic of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body of knowledge in finance. Secondl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inancial thought and Marxist financial theories at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cognition, so as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hirdly, it proposes several necessary principles of practic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financial fu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Second Combination”; Marxist Financial Theory;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nancial Powerhouse”

**JEL Classification:** A13, B14, B19, G28, N25

(责任编辑:冀木)

(校对:朝东)